

六合叢書

无声无光集

张 晖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六合叢書

无声无光集

张 晖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声无光集/张晖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308-10816-4

I. ①无… II. ①张…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06628号

无声无光集

张晖 著

策 划 周 运

责任编辑 王志毅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北京百川东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7

字 数 128千

版 印 次 2013年2月第1版 2013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0816-4

定 价 29.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0571) 88925591

目录

自序 1

第一辑

- 一 中国的“诗史”传统 5
- 二 唐诗中的酒价 16
- 三 元稹的梦 23
- 四 姜白石的爱情 29
- 五 “商略”创造的情境 35
- 六 诗歌中的南明秘史 39

第二辑

- 七 我们怎样理解黄侃 47
- 八 俞平伯的淑世情怀 59

九 徘徊在文化与政治之间——汪伪时期词人龙榆生的活动 67

十 怀念高华老师 85

第三辑

十一 唐诗的传承 95

十二 慢慢经典化的《中国文学批评》 103

十三 从《陈维崧集》看清代别集整理 109

十四 评周绚隆《陈维崧年谱》 114

十五 跋陈璧君钞本《双照楼诗词稿》 120

十六 文章之道与思想表达 126

十七 书院的知识生产与清代人文图景 131

十八 且把金针度与人——读《陈垣史源学杂文》（增订本） 141

十九 学界别裁——读胡文辉《现代学林点将录》 146

第四辑

二十 文学的力量——陈国球先生访谈录 153

二一 步入文学所，就是步入实现理想之路——吴庚舜先生访谈录 177

二二 徐公持先生访谈录 192

自序

钱谦益《牧斋有学集》中有一卷诗叫《长干塔光集》，其中收入一首长诗专讲顺治十四年（丁酉，1657年）冬天南京长干塔于夜间大放光芒之事。长干塔是明永乐十年（1412年）敕建大报恩寺时所造的九级琉璃塔，高百馀丈，为当时全国最高建筑，以琉璃、黄金铸成塔顶，鼎盛时夜间更有一百二十八盏燃灯，其光远播几十里外。据陈寅恪《柳如是别传》考证，当时钱谦益正住在长干寺秘密从事复明运动。那么，他在诗中刻意表彰长干塔大放光明，其寓意可知。有趣的是，当晚陪同钱谦益一起礼塔的还有钱澄之，但他却在自己的诗中说长干塔“是夜仿佛有光”。这不是陶渊明“仿佛若有光”的希望，而是陷入黑暗的绝望。长干塔是否放光，必然有一个客观的事实，然而却因诗人的心境有所不同，光芒便在有无之间。

在我现在的住所，也可见一座高约五十米的慈寿寺塔。此塔为万历四年（1576年）神宗生母李太后所建，因檐角挂有风铃三千多枚，俗称玲珑塔。微风拂过，清脆之声曾遍及禅院，

撒落四周人家。如今慈寿寺已毁，风铃早已不存，有声的宝塔，遂成无声的沉默。

在嘈杂的市声与闪烁的霓虹中，面对无声无光的石塔，我日复一日地读书写作，只为辑录文字世界中的吉光片羽。本书所收录的这些文字，即为我几年来在编校古籍、撰写论文之外的部分感想，正是书中这些有声有光的人与文，陪我度过了无声无光的夜与昼。

是为序。

张 晖

2012年7月14日

第一辑

一 中国的“诗史”传统

中国是一个深具历史感的国度，以至于凡是在诗歌史上被称为“诗史”的作品几乎都被视为是伟大的，因为这些诗歌的内容指向了确凿可证的具体史事，所以其价值不证自明。而我们在阅读诗歌时，也早已习惯从诗歌中寻找各种历史信息，诸如作者的生平、家世、交游等，以为谈史的资助；而罔顾诗人殚精竭虑地在格律和形式之间铺排、展开其诗艺、美学、情感和思想。这种阅读倾向不仅在普通读者中常见，就是对于具有良好文史修养的专业批评家而言也是如此。但与普通读者喜欢在作品中搜索年、月、日、地理、人物等直接的历史信息不同，专业批评家往往更喜欢从诗歌的比兴、美刺、讽喻等修辞中去窥测诗人的政治态度和立场，从而将多义的诗歌指向具体而又特定的历史语境。

久而久之，我们已习惯在诗歌阅读中另辟通往历史的蹊径，并发展出一套行之有效的阅读方法——“诗史互证”——来配

合这一阅读目的。清初以来，著名学者钱谦益、朱鹤龄、仇兆鳌、浦起龙等人注释杜诗，姚文燮、王琦等人注释李贺诗，朱鹤龄、姚培谦、冯浩、张尔田等人注释李商隐诗，都试图将孟子“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的理论与“诗史”理论结合起来，通过对诗中的比兴等修辞手法及典故、词义的训释来阅读诗人如何在诗中传达对重大现实事件的看法，从而形成一套娴熟运用于诗歌阅读并服务于历史学的“诗史互证”的方法。这种研究方法经过近代著名学者刘师培、邓之诚、陈寅恪等人的发挥，至今仍广泛而又深刻地影响着学术界。

需要追问的是，这种以诗为史的观念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

“诗史”一词从晚唐《本事诗》开始正式成为文学批评概念。《本事诗》里说：“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可见在其语境中，所谓的“诗史”必须具备两个条件：首先是杜甫在安史之乱中流离陇蜀时所写的诗歌；其次，杜甫在写作这些诗歌时，记录了他流离陇蜀时的全部事情，连十分隐密的事也不例外，甚至没有任何遗漏。两者缺一不可，构成“诗史”的内涵。此后，“诗史”一词的内涵得到不断地增衍。如果加以简略概括，大致有十七种之多。其中较为重要的，比如《新唐书》里专门强调“善陈时事的律诗”，理学家邵雍则将之理解为一种“追求普遍性的诗学”；还有强调“知人论世”的，杜诗忠实记载客观事物如酒价、年月日、地理、数字、人物等，杜诗的叙事功能，杜甫忠君爱国；等等，不一而足。这些“诗史”的内涵，影响大

多止于一时、一地甚或一人。综观历代的“诗史”说，其间贯彻着一个最为基本的核心精神，那就是强调诗歌对现实生活的记录和描写。

从孟棻《本事诗》强调杜甫流离陇蜀时记载所见所闻的诗歌开始，“诗史”说就不断强调诗歌对于外在现实世界的记录和描写。宋代的“诗史”说虽然繁杂，但无论是《新唐书》所说杜诗中“善陈时事的律诗”，还是其他的论述强调杜诗的实录、史笔、知人论世、叙事等，实际上都指向同一个基本的文学理念，即诗歌的内容须记载、反映外在的现实世界。而明代复古诗论中的大量论争以及清代王夫之、钱谦益、施闰章、陈沆等人的论述，也都是在 不违背此一理念的情况下展开的。可以说，强调诗歌记载现实生活的“诗史”说，起源于晚唐，到明代就基本稳定下来，成为中国传统诗学中一贯要求诗歌描写现实、反映现实、记载现实的一种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诉求。

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诗歌须描写现实既是“诗史”说中的一个基本内涵，也是历来中国诗歌理论中的一个常见论说。方孝岳曾在《中国文学批评》中提到《左传》赋予许多《诗经》中的诗歌以本事，即表明在中国早期的文学观念中诗歌是要以具体的现实生活为依据的。（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6 年，第 17—19 页）到了汉代的《毛诗序》，更加清晰地表明诗歌要记载“一国之事”和“天下之事”，诗歌和现实之间由此产生了密切的关联。至唐代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说：“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核”即真实

的意思。(许慎如此解释“核”(覈):“覈,实也。……遮其辞得实曰覈”,许慎撰、徐铉校定《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第158页上。)白居易说诗歌背后的事“核而实”,即强调诗歌记录事件的真实性。在这种观念下,诗歌就要尽量做到对现实的忠实再现与模仿。

较之汉代《毛诗序》、中唐元白新乐府运动等理论,“诗史”说在对于诗歌如何记载现实生活的问题上无疑概括得更为简洁与凝练。“诗史”说不但继续强化了诗歌对现实模仿的创作倾向,而且它的众多内涵从各个方面、诸多层次给了这种创作倾向予具体而微的指导、说明。诗歌记载现实的观念和创作倾向,正是由于“诗史”说的推波助澜,自宋代以后才得以深入人心。

从中国诗歌史的历程来看,自觉运用诗歌来记载重大历史事件的行为,无疑始于杜甫。宇文所安发现,当时除杜甫外很少有其他诗人记载安禄山的叛乱(贾晋华译《盛唐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224页)。宇文所安的观察十分敏锐,他注意到杜甫这一自觉的创作行为实际上已经不同于当时流行的对于诗歌本质的理解——宇文所安在此并未对此作出说明。需要补充论述的是,杜甫对诗歌本质的理解无疑已经开始转向诗歌应记载重大历史事件,这种对诗歌本质的新理解一旦转化为创作实践,就使得杜甫在诗国里不断地得以开疆拓土。而杜甫这种注重诗歌记载重大历史事件的创作观念之所以能在后世形成广泛的影响并被普通作者接受且运用,乃是自晚唐孟棨以来诸多“诗史”说推波助澜的功绩。

“诗史”说同时也促使产生了将诗歌创作简单视为史料记录的观点。宋代“诗史”说中就已经强调诗歌忠实记载外在的世界，如记载年月日、尺寸、地理名词、人名等，并开始用杜诗来证史；这个倾向由明代的杨慎进一步光大，到清初钱谦益、黄宗羲的手里发展到极至。由此，不仅在理论上诗歌已经成为历史的史料，而且在创作实践中很多诗人写作诗歌的目的就是为了记载历史。这些现象的产生绝非突兀，均受到“诗史”说中要求诗歌忠实记载外部世界的影响。

当然，强调诗歌记载外在世界的论说并不代表“诗史”说发展的唯一方向。历代的“诗史”说，也一直强调诗歌在记载现实时要重视诗歌的文学性。比如《新唐书》的“诗史”说强调杜甫的律诗，宋代邵雍重视诗歌的本体，其他宋人强调杜甫诗歌的叙事功能或者杜诗的《春秋》笔法，明代诗论家如杨慎、许学夷、王夫之等希望诗歌通过抑扬讽刺、比兴、美刺等写作手法来记载现实，从而可以保持诗歌含蓄蕴藉、微婉甚至情景事合一的美感。

历代的“诗史”论述尤其重视诗歌中“情”的作用。《本事诗》一书就强调“情”，到了明代这种倾向更为明显。如杨慎认为诗歌要“道性情”，而非记录事件。又如王世贞认为，被称为“诗史”的诗歌在创作上均使用“赋”，他引用李仲蒙的话说：“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物尽也。”（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一，见《历代诗话续编》，第954页）可见，王世贞认为赋是用来言“情”的。许学夷则认为“诗史”要“述情事为快”，将

“情”和“事”并列。王夫之提倡“情景交融”、“情景事合一”，对“情”尤为重视。可以说，他们“诗史”说的重点并不在于诗歌是否反映现实，而是在如何反映现实的基础上通过强调比兴、美刺等创作手法，保持诗歌抒情的美学特征。这部分“诗史”说实际上契合了中国诗歌的抒情传统。

陈世骧曾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提出中国文学拥有一个“抒情传统”，他认为抒情传统起于《诗经》，因为《诗经》是一种唱文，“弥漫着个人弦音，含有人类日常的挂虑和切身的某种哀求，它和抒情诗的要义各方面都很吻合。”（陈世骧《中国的抒情传统》，见《陈世骧文存》，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页）陈世骧之后，学术界沿着他开辟的思路继续加以深入，逐渐认为“情”的内容不仅仅包括个人的层面，还应该包括社会的层面。

我们可以进一步说，以《诗经》、《楚辞》为基准的中国诗歌传统，使得诗人在创作时，往往将个人的情感和家国的记忆交杂在一起。这一点，传统诗学中自《诗大序》开始就给予了充分注意。经过陈世骧、高友工、蔡英俊、郑毓瑜等人逐渐建构起来的中国抒情传统，也强化了这种认识。可惜到目前为之，他们的抒情传统建构还基本集中在唐代以前。而自唐末发展起来的“诗史”说，在保持诗歌抒情本质的前提下，通过美刺、比兴等手段，将诗歌中原本属于作者个人的情感，提升到整个国家、社会的集体情感。不但充分满足了诗歌记载外部世界的要求，还补充了抒情传统在唐宋以后建构的不足。

抒情传统虽然使得“诗史”说不断地反省和增加诗歌抒情

的部分，但诗歌反映现实观念非常强大，使得“诗史”说也慢慢地开展出一些抒情传统所无法笼罩的内容：这就是延续白居易为代表的诗歌忠实记录外在世界的观念，这个观念在宋代“诗史”说中已经得到讨论，到清初发展到极至。诗歌由此成为历史的史料，而写作诗歌就是为了保存历史。也就是说，到清初的时候传统诗学中强调作品对于外部世界忠实的模仿很有可能突破抒情传统，形成另外一套类似于西方诗学中的模仿（mimesis）理论。但与此同时，另一条发展线索也表明，从宋代苏辙开始经过明代何良俊直至清代的王懋竑，均对元白诗歌的叙事有所批评，可以看到诗论家对于诗歌忠实记载现实有着很多的不满，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认为元白的诗歌缺失了诗歌本身的美感。这种模仿理论和抒情传统的冲突，直到清代才得以解决。清代大量的诗歌笺注者利用以诗证史的方法来阅读诗歌，开始重新重视诗歌的文体特征，强调诗人通过比兴、美刺来委婉地传达对现实重大事件的看法，从而将强调模仿的“诗史”说重新纳入抒情传统之下。可见，“诗史”说虽然一度强调诗歌忠实记录外在世界，但终因与强大的抒情传统完全背离，因此难以充分发展出一套模仿理论。

尽管如此，经过不断争辩，诗歌要在保持抒情美学特征的基础上记载现实观念逐渐深入人心。这种观念，因为同时满足了抒情传统与诗歌模仿现实的需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不仅影响到诗歌的创作，而且还影响到后世阅读诗歌的习惯，并慢慢与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等观念结合起来，形成一套“诗

史互证”的学术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经过近代学者陈寅恪等人的发挥，其影响一直到现在。

然而对“以诗为史”的反省从来没有停止过。清代著名学者纪昀在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开始评点《瀛奎律髓》，他评论杜甫《正月三日归溪上有作简院内诸公》一诗时说：“此老杜独有千古处。然自‘诗史’之说行，注家句句关合时事，亦多有非老杜本意处也。”（方回选评、纪昀刊误、诸伟奇、胡益民点校《瀛奎律髓》，黄山书社1994年，第560页）纪昀不能认同的是将每句杜诗都联系上时事来解释。稍后的毕沅也对“以诗为史”的阅读风气表示不满，他希望通过杜诗来引导当下的风气，使之回归风雅的传统。这自然是《毛诗序》中“美教化、移风俗”的延续。不过，毕沅既有此想法，自然就不满足于将诗歌的功能直接归结于历史了。

晚清以来，“文学”作为西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大学的教育体制，从传统的“词章之学”逐渐向讲究“美感”、“虚构”等西方观念过渡，慢慢地被国人所接受。尽管史学家和多数的文学史家仍然痴迷于“以诗为史”的阅读方式，并将之贯彻到现代的学术研究之中，但很多学者开始反省这种阅读方式的弊端。1962年，杜甫诞辰一千二百五十周年。大陆学术界对杜甫大加褒奖，与“现实主义”的荣誉紧密相联的就是“诗史”。但郭绍虞在上海冷眼旁观，偏偏指责“诗史”的说法：

大抵自诗史之说兴，而注杜者遂多附会史事之论。……